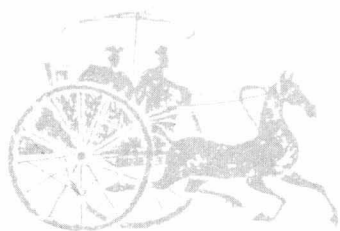


管子思想鉤沉

邓加荣 张靖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管子思想鉤沉

邓加荣 张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思想钩沉 / 邓加荣, 张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5556 - 1

I. ①管… II. ①邓…②张… III. ①法家②《管子》—研究 IV. ①B226.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57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琳

责任校对 王 超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沙滩后街55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126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管子思想钩沉

《管子》作者年代考	(3)
《管子》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	(13)
管子经济思想的多层面透析	(25)
管子法制思想三探 ——谈谈法制和以法治国	(36)
管子的人才观	(45)
管子的教育思想	(55)
管子的道德观、荣辱观	(64)
管子的义利观、价值观	(83)
《管子》中的“与时俱进”思想	(101)
《管子》语言的深刻隽永,精辟独到	(107)

先秦文化杂俎

《易经》是一部有大智慧的书	(127)
儒家构思的几个理想社会与孟子小康社会的践行	(139)
墨子经济思想纵析	(156)
荀子经济思想捭阖	(170)
孟子、荀子关于性本善与性本恶的一场大论战	(196)

管子思想钩沉

《管子》作者年代考

《管子》究竟为何人所作，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管仲所著，有的说是战国以及秦汉时好事者为之，甚至有的说是魏晋以后的伪作。《管子》是不是管仲所著，这个问题确定下来十分重要，

因为管仲是春秋初期（公元前 730—前 645 年）的一位政治思想家，他所留下来的《管子》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系统理论、体例完备的学术著作，较之古希腊柏拉图



管仲 （公元前 730—前 645 年）

（公元前 427—前 347 年）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 年）的许多著作，都要早出三四百年。

有人说，《管子》书中常有“管子曰”“管子云”或“桓公谓管子曰”等话，不像作者的口气。更可疑的是，书中多处提及管仲病危及其身后多年的事，例如《形势解》

篇中有“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等话。考这五伯，乃自齐桓公起直至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止，前后共经历了两百余年才形成的。管仲之时，哪有“五伯”这等的話？又如《小称》篇中有“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考西施、毛嫱皆越国之美人，一为范蠡之妾，一为勾践之姬，都是管仲身后之事。

再从内容上看，全书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二十余万言，广涉旁触，庞杂丛芜，篇章散乱，段落重复，一个题目与一个主旨，却在几个篇章里被反复赘述，又将诸子百家之言，皆收揽其中（郭沫若说：“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医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互相矛盾之处，屡见不鲜。

这些指陈，无疑都是有道理的，但因此而否定《管子》为管仲所著，则未免有些偏颇，立论不足。若说书中常有“管子曰”等话，这就像《论语》中常有“子曰”“子云”的话一样，只能证明此书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作者的好友、信徒等人所笔录与追忆的，而不能因此就得出否定的结论。至于书中常有管仲身后百年之事，也不能就此而将其全部推翻，这只能说明后人在整理书稿时也添补和追加了许多自己的话，有狗尾续貂之弊。但不能因为有了狗尾续补，貂皮就不再是貂皮了。

若说《管子》全非管仲所作，都是战国和秦汉时人所为，那么，司马迁的《史记》中怎么会有这样的话：“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又说：“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

不论，论其轶事。”

司马迁为汉武帝时的史官，皇家秘府藏书甚多；经史典籍他都可以见到，什么书他都读过，而像《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动辄数十万言或上百万言的书，也未见他有“详哉其言之也”的赞叹之语。可见，他对管仲的著述信而不疑，是钦佩与厚爱至深的。再说，他生活的年代距汉初只有六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
前135—前86年）

十余年，距秦始皇一统天下也不过百年，若是《管子》皆为秦汉时好事者所作，凭司马迁的深厚阅历，焉能辨别不出其真伪，还要专辟《管晏列传》一章而对其书大加赞扬吗？古人自西汉时起，皆都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实不里，其文直，其事校，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既如此，他焉会独在此处不按事体实录，而将伪劣当真，予以虚妄称赞呢？郭沫若说：“《轻重篇》成于汉文、景之世，皆确凿有根。”未免夸大其词，大言骇众！试想，文、景之时司马迁已经在世，焉有他对同时代人的伪作也看不出来，还要在《史记》中点名道姓地指出《轻重篇》为管仲所作呢？

详考历史，在汉初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

人们对于《管子》一书还是颇为重视的，因为，书中讲的多是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道，正符合当时历经多年战乱亟须恢复经济和安定社会秩序之需；就是到了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管子》一书也还受到尊崇，书中所言的盐铁官营与国家调控市场物价和商品流通等方针政策，也都为理财官孔仅、桑弘羊等所采用，在一部《盐铁论》中，多处提及管仲，并常常引用《管子》之文（详见其《力耕》《本议》《援时》等篇）。这时，并未见有人提出《管子》是伪作之说。

一百年后到了汉成帝时，因见诸子百家之作多已佚失散落，残缺不全，于是他下令给光禄大夫刘向，让他竭尽全力收集天下的遗书，从儒家的经史典籍，到诸子百家、各行各业的所有著述，统统编纂校定，核准勘实之后重新出版。每部书刻出之后，刘向都要“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向皇上详奏一番。刘向在校定《管子》之后上疏称奏说，《管子》“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接着，他详述了“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其中，未曾有一句话提及八十六篇之中有伪作与续作，且在结尾处重引司马迁的话，感叹其书“详哉其言之也！”班固作《汉书》时也说“管子，八十六篇”，与刘向的说法完全一致。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否定管仲是《管子》的作者，或者说是它的主要作者。宋、明时期，有人说《管子》是魏晋以后的伪作，更是没有道理的！细查，现今世上流传的《管子》各篇章，基本上皆存于汉刘向所辑的书中，魏晋之人的伪作，焉能收到前代人所辑录的本子之中

呢？

但是，反对论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们所提出的某些论点和论据，也都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且不要说，书中谈及一些管仲身后之事，除了前面提到的“毛嬙西施”之外，还有“吴王好剑”“天下之国，莫强于越”（《轻重甲》篇）等许多地方；而且，最令人生疑的是，《管子》体系杂乱，



刘向（约公元前 77—前 6 年）

庞杂芜荒，有些论述很明显是与管仲的思想体系不相符合的。例如，《幼官》与《幼官图》，讲的全是阴阳五行、襁祥灾变之术，说的全是阴阳家邹衍的学术思想，在管仲之时，此说尚不盛行。而且，在现存的《管子》七十六篇中，只有这两篇孤零零地夹在其中，也实属不伦不类。还有，《版法解》中有一段话：“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讲的全是墨子的学术思想，而墨子晚于管仲，甚至也晚于孔子将近百年，在管仲之时，是不可能有“兼爱”这一命题的。

再从篇章结构上来看，该书的编排次序混乱，颠三倒四，反反复复，全无一点逻辑。一个题目前篇讲了，后面篇章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让人一眼就看出来，该书绝非出自一

人之手，否则，作者为什么那么健忘，刚刚在前面讲过，后边又累赘不堪地重复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匡》《中匡》《小匡》三篇。这几篇都是讲述管仲从政任相的历史经过及其治国的方针政策的，本来有一篇就足够了，可是这里，却反反复复地拖成了三篇。三篇的内容只在细节上稍有繁简差异，而基本梗概却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再拙劣之手，也不会造出此一弊端的。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管子》一书中既有管仲之所作，亦有很多篇章为后人之补续，所以晋代傅玄推论“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南宋叶适论断“《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黄震《日抄》中言“《管子》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等，是完全正确的。

这样一来，问题也就跟着而来了，一部《管子》七十六篇，究竟哪几篇是管子的原著？哪几篇是他同时代人根据他的口述补记和追忆的？哪些篇是战国与秦汉之时好事者为为之的？而更重要的，又是哪些人为为之的？这些便成了千百年来人们都曾思虑过但却没有人破解过的谜题。但破解此事对研究管子的主体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哪些篇章是管仲所著呢？纵观《管子》全书的编写体例、思想内容、行文笔法、遣词造句风格以及说话的口气，可以断定该书第一册的七篇文章，即《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皆出自管仲之笔。

何以知之？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明言“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这里，他已肯定了这五篇是管仲之所作。这五篇中，《九府》已经散失，《山

高》经过考证即《形势》，因此，有五篇皆明为管仲所著。至于《权修》《立政》两篇，司马迁虽然未提，但其文势及其论述，与前面几篇文章一脉相承，是不容分开的，显而易见，是出自一人之手。对于第一册这几篇文章，刘向在分类时又标之曰《经言》。《经言》正如《春秋》《左传》合刊时的体例，孔子所撰的《春秋》曰《经》，左丘明所写的《左传》曰《传》。根据这个体例推理，《经言》中的七篇文章皆出自管仲之手，是毫无疑问的；而后面的几册：《外言》《内言》《短语》《杂篇》《管子解》，显而易见，是对《管子》正册七篇文章的补记与追忆，是杂陈与注疏理解性的文字。所以，载在《经言》中的《牧民》《形势》《版法》等篇目，又在《管子解》一册中，重立了《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等篇目，定为后人续补之作，已是十分明显的了。有的篇虽然没有标注“解”字，但就其内容来看，也可十分明显地看出是注解与诠释《经言》正文的文字，如在《乘马》一篇之后，在《管子解》一册内又设立了《臣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三篇，显而易见，是专为《乘马》而写的续作。

再从文字上来看，《经言》七篇用的皆是古朴简洁之语，气势磅礴，朗朗上口，且其中多有传世的名言警句，例如“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等，恐怕这些话在管仲执政的当时，已为齐国人所耳熟能详，就像我们今天人人皆道“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等语一样。

再从语句上来看，在《经言》的七篇中，可有一句称“管子曰”“管子云”的话吗？没有！因而可以确信不疑地说，此

七篇实乃《管子》的主体，是出自于管仲之手的。

除了《经言》七篇之外，还有没有管仲的自著呢？肯定还有，像《问》《势》《山国轨》篇，从内容与语句上看，肯定皆是。此外，还可以稍做肯定的是《小匡》篇。《小匡》一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管仲从政任相的经历和他富国强兵的基本思想和政治主张，不像有的篇章，名曰管子思想，实则偷偷地塞进假货，以假乱真，把儒、道、法、名、阴阳家的诸种学理都灌输其中，弄得一部《管子》不伦不类。

管仲在《小匡》中，首次对士、农、工、商做了社会四大集团的职业划分，并提出定居而处、划地经营的政策。这是管仲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对四民的排列次序，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我们说《小匡》一篇必出自管仲之手；即使不是管仲自己完成的，也是由协助他一起治理齐国的所谓五子，即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王子城父所为。管仲曾经称他们“为夷吾之舌也”（《戒》），并说他自己“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

至于现存的《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丙》《轻重丁》《轻重戊》五篇是否为管仲所作，则是一个最令人作难的问题。按司马迁《史记》中所言，他所列举的管子五篇著作中就有《轻重》一篇，而在刘向所编写的本子中则列出了七篇，并标明后两篇《轻重己》与《轻重庚》已经佚失。对于留下的这五篇，持儒家观点的人最为讨厌，一概贬之为后人伪作。傅玄曰：“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唐代大儒、曾经注疏过儒家全部经典的孔颖达直言不讳地说：“《轻重》篇或是后人所加。”南宋叶适也说：“故《管子》之尤谬妄

者，无甚于轻重诸篇。”

历代儒家之所以如此地菲薄与排挤《轻重》诸篇，倒也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做了提示，《轻重》诸篇所阐明的，纯粹是《管子》的经济思想，与儒家扶本抑末思想是正相反的。而古代善于管理经济、通晓市场与货殖运作之术者，如西汉之孔仅、桑弘羊等人，倒是特别重视《轻重》诸篇，考管仲之所以卓越于历代治世能臣之上，连孔子都深服他的才能，说他有此才能不仅可以称霸，完全可以称王。管仲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让地处海滨的区区齐国，国富兵强，人民归之如流水，正是他深知轻重之术，大兴盐铁之利，善于调控市场、物价和商品流通所致。

司马迁对管仲的这些政策措施，是非常称赞的，他在《史记》中简要地将其概括为“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故论卑而易行，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在一部纵论上下将近三千年治国平天下的《史记》中，像这样给予一个人如此高度的评价，还只有管仲一个。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管子思想精髓部分的《轻重》五篇，纵然不是管仲亲笔，也是他的亲近、协助他一起治理齐国的五子等人和以后继续沿管仲之法治理齐国的人所写的。《管子》一书中涉及轻重之术经济思想的还不止以上五篇，在《乘马》《权修》《国畜》《海王》《山国轨》《揆度》《地数》《山至数》《山权数》《侈靡》等十六篇中，也都有着详细的论述，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都极为精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纵观《管子》一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字，其实乃我国

古代所有著述中首屈一指的一部巨著，其理论之精湛、思想之超前，在整个经济思想史上，即使放眼到世界范围内，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期里，也是十分珍贵而罕见的。

《管子》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

《管子》是管仲及其追随者们所著述的一部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书，是中国古代一部政治思想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它叙述了管仲一生从政任相、强国富民的宏伟政治理想和丰富的治理经验，连司马迁都拍案称绝地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管仲治国几十年，使地处海滨的一个区区齐国，通过治理整顿与通货积财而富甲天下，成为泱泱大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造就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大业。管仲治国，一直注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他知道，只有社会和谐，才能长治久安、民富国强，即他所说的“和则能久”，“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白心》）。为此，他提出了许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于古于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他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发展经济，建立强国富民的物质基础，提出为历代人所称颂的治国名言：“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轻重甲》）

管子称社会和谐为“人心顺”，称不和谐为“人心逆”。